

江南文脈的空間流行

——《世說新語》在東亞

張 伯 偉

一、釋題

談到「文脈」，人們一般都是從時間角度來思考，本文希望加入一個空間的視角，即以東亞為視野，看江南文脈在歷史上的展開。

作為江南文脈的代表之一，本文要集中討論的是《世說新語》，其中既包括南朝劉義慶的《世說新語》原書，也包括明代王世貞增刪的《世說新語補》。就空間流行而言，後者的影響力更大。

二、《世說新語》在朝鮮半島

《世說新語》為劉宋時代臨川王劉義慶集台賓客纂成，在此之前，類似的書已有裴啟的《語林》，曾風行一時。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載：「裴郎作《語林》始出，大為遠近所傳。時流年少，無不傳寫，各有一通。」^①劉義慶書更為精彩，加上其王侯身份，此書風行之狀就更可想見。在宋齊之間已有敬胤為之注，梁代又有劉孝標註，即代表了當時人閱讀、鑽研此書的風氣。南齊臧榮緒纂《晉書》，也多采《世說》故事。至唐初貞觀年間修《晉書》，踵事增華，採錄《世說》多達三百五十則，更擴大了《世說》在社會上的影響。

這樣一部風行於世的著作何時何地通過何種途徑傳入朝鮮半島，文獻上沒有明確記載。韓國金長煥教授《世說新語》在韓國的流傳與研究》根據

崔致遠《春曉偶書》一詩尾聯「思量可恨劉伶婦，強勸夫郎疏酒杯」句，以為典出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，這是能夠成立的。金教授又根據詩中「亂世」一詞，將此詩推定為崔致遠晚年之作，進而將《世說新語》傳入的時間擬定為公元九〇〇年之前。^②只可以說存在這種可能。因為崔致遠早年留學大唐，以賓貢進士及第，他完全有可能在唐之日就讀過《世說新語》，故其詩未必可以作為《世說》傳入朝鮮半島時間的證據，何況此詩也未必就是其晚年之作。

《世說新語》撰成的劉宋元嘉時代，半島還處於三國鼎立階段，新羅地處海隅，其吸收中國文化的進程，自較高句麗、百濟為後。但到了智證王（公元五〇〇—五二三年在位）時代，取「新者德業日新，羅者網羅四方之義」，立國號為「新羅」（此前或用方言土語稱徐那伐、斯羅、斯盧）^③，又下令禁殉葬，制喪服法、謚法，大力吸收中國文化；至法興王（公元五一四—五三九年在位）「肇興佛法」，也正值梁武帝時代，以佛教為因緣，使臣及僧人往來更為頻密，法物、經論大量傳入。阮孝緒《七錄》因為將「方外佛道各為一錄」，將佛法錄列為第六，其書序文就被收入到《廣弘明集》中。《世說新語》記錄了大量名僧的風采言行，其受到佛門重視自可想見。到了真興王（公元五四〇—五七五年在位）時代，「花郎」興起，對魏晉風流、名僧風采多有效仿。^④以此推斷，《世說新語》在梁代就有傳入新羅之可能。

真德女王二年（貞觀二十二年，六四八），金春秋使唐，史載唐太宗「賜御制《溫湯》及《晉祠碑》並新撰《晉書》」^⑤，《世說新語》中的故事，也會隨

着《晉書》的傳入而更加深入人心。至孝成王二年（開元二十六年，七三八），唐玄宗遣邢璣往弔聖德女王，而有「新羅號為君子之國，頗知書記，有類中國」^⑦之嘆，可見東國文化已發達至很高水平。又據《三國史記·金大問傳》：「聖德王三年（七〇四）為漢山郡都督，作傳記若干卷，其《高僧傳》、《花郎世記》、《樂本》、《漢山記》猶存」^⑧。其中《花郎世記》即花郎的歷史和傳記，此書在高麗朝中葉尚存，以後亡佚。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韓國慶尚南道金海地區發現此書抄本，乃學界一大幸事（儘管對此書真偽學界尚有爭議，但多數學者肯定它是金大問之著）。花郎道的歷史原貌如何，《花郎世記》能否如實反映是一回事，但作者突出什麼、如何寫作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更重要的事。在金大問的筆下，花郎的形象多為風姿俊秀，善於清談，如魏花郎「面如白玉，唇若赤脂，明眸皓齒，談下生風」^⑨；未珍夫公「貌美而多才」^⑩；二花郎「膚如玉膏，眼如笑花」^⑪；世宗「端雅，美風儀」，薛花郎「美風彩，善玉笛」^⑫，簡直就是《世說新語》中《賞譽》、《品藻》、《容止》篇的人物。作者表彰的「二花風流，雞林清談」^⑬，清雅高標，花郎典型^⑭，與《世說新語》崇尚清談、標榜風流的宗旨也若合符契，實難排除其影響。所以我認為，《世說新語》之傳入朝鮮半島，至晚也在八世紀以前。

在高麗時代和朝鮮時代前期，《世說新語》同樣頗受歡迎，但主要看重其清談之妙，故多用作詩文典故。《世說》書名的明確出現，是在李奎報的《次韻吳東閣世文呈誥院諸學士三百韻詩》中，其中有「恩能懷密老，威已懾王姨」句，自注云：「王夷甫姨也，事見《世說》」^⑮。《世說新語·規箴》記載李陽對王夷甫婦有威懾，此詩當用此典故，「王夷甫姨也」之「姨」應作「婦」，此或為李奎報一時筆誤，亦或純粹就是手民之誤。此詩作於高麗明宗二十五年（一一九五），而根據金長煥教授的調查，李奎報文集中使用的《世說新語》典故，多達八十餘則。這是《世說新語》傳入朝鮮半島后發生影響的基本形態。值得注意的是大儒李退溪，其詩文多處使用《世說》

之典，在柳道源《退溪先生文集考證》中，就揭示了其中二十六例。

在朝鮮時代也出現了兩種與《世說新語》相關的衍生作品：

一、《世說新話匯抄》，寫本，佚名，封面題為《塵談》，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。其內容是將《世說新語》中一人之言行匯抄在一人名下，以方便瀏覽。大致以《世說新語》中出現的人名前後為序。

二、《世說新話類抄》，寫本，佚名，藏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（今韓國中央研究院）。書上鈐蓋了「朴鉉」的圖章，扉頁上有現代人所寫一行字：「朴鉉（一六三九—一六九六），字晦叔，號止觀齋。」此書與上書內容一致，簡省了部分註釋。

雖然這項工作就學術眼光視之，無多大意義，但也能反映《世說新語》在朝鮮半島的流傳。此外，這樣的思路也啟發了後來者，如《世說新語姓彙韻分》，就是將人名按韻排列，更加便於查考。

三、《世說新語補》在朝鮮半島

明嘉靖三十五年（一五六）主世貞將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和何良俊《語林》合二為一，「蓋《世說》之所去，不過十之二，而何氏之所采，則不過十之三耳」^⑯。至萬曆十三年（一五八五），張文柱校注其書，將王世懋的批點與王世貞之刪補合刊。此書一出，風靡一時，甚至壓過了劉義慶的原書，不僅在中國如此，而且影響到朝鮮半島和日本。

據朝鮮李宜顯《陶峽叢說》的記載：「晉人樂放曠、喜清言，其弊也及於國家。……然其談論風標，書之文字，則無不澹雅可喜。此劉義慶《世說》所以為楮人墨客所劇嗜者也。……明人刪其蕪、補其奇，作為一書，誠藝林珍賞也。朱天使之蕃攜來贈柳西垞，遂為我東詞人所欣睹焉」^⑰。既然此《世說》是經過「明人」刪補，則可以斷定其為《世說新語補》。文中提及的「朱天使之蕃」，祖籍金陵，萬曆二十三年（一五九五）狀元（今南京市

莫愁路仍有朱狀元卷），官至禮部侍郎，改吏部，萬曆三十四年（一六〇六）作為正使赴朝鮮頒詔。朱之蕃將此書帶到朝鮮，引起了朝鮮文人的一時熱衷。洪奭周《洪氏讀書錄》著錄了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、何良俊《何氏語林》，在其下加案語曰：「王世懋（懋）為「貞」之誤，下同）嘗合兩書而刪之，以為《世說新語補》，今盛行於世者，率世懋本也。」¹⁹就是相對於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原書而言。

不過，李宜顯的記載乃在事後一百三十年，所以不盡準確。實際情況是，朱之蕃一行作為「天使」蒞臨朝鮮半島，宣祖十分重視，派柳根（西垞）為遠接使，柳根又選擇許筠為從事官，負責具體接待工作。根據許筠當時的記錄，「三月二十八日，抵肅寧。上使招余人，……因出《世說刪補》、《詩雋》、《古尺牘》等書以給」²⁰。許筠得到此書，或許只是一個偶然的機緣，但因為是許筠而非別人得到此書，就產生了不同結果。他不僅反覆研讀此書，而且憑藉自己腹笥之富，加以詳細註釋，成為域外《世說新語補》註釋的第一書。其《世說刪補註解序》稱：「晉人喜清談，辭簡指遠，語語有玄解。風流宗尚，至於江左極矣。撮其旨者登之於簡，初曰劉義慶氏，世所傳《世說新語》者是已；六朝以還，逮於勝國，名大夫士隻言緒論，可配於典午諸賢者，暨漢魏晉三代名人所談挖見遺於劉氏者，收錄而成書，曰《何氏語林》，世所稱東海元朗氏之所述者是已；合二書而雌黃之，以語晦而捐劉之十二三，以說冗而斥何之十七八，超然以自得為宗，刪二書而為一家言者，曰吳郡王元美（世貞）氏也。……劉《說》、何（良俊）書行於東已久，而獨所謂《刪補》者未之睹焉。曾於弇州文部中見其序，嘗欲購得全書，願未之果。丙午春，朱太史（之蕃）奉詔東臨，不佞與為僚僚，深被獎誦。將別，出數種書以贈，則是書居其一也。不佞感太史殊世之眷，獲平生欲見之書，如受拱璧，拜而卒業。益知二氏之為偏駁，而王氏之為獨造也。因博考典籍，加以註解。雖未逮孝標之詳核，亦不失為忠臣也。使元美知之，則必將鼓掌於冥冥中以為愉快焉。」²¹許筠不僅註釋此書，並有

仿「《世說》體」之著，曰《閑情錄》，流傳至今。他還發表了一些讚美、鼓吹《世說補》的言論，朝鮮文壇對此書感興趣，與許筠的上述行為都有關係。但可惜的是，許筠不久便死於非命，其《世說刪補註解》自然無刊刻機會，而且也因為他的關係，導致此書在後來遭到「冷遇」。

在當時的朝鮮文壇，許筠頗以文章著名。他對《世說新語》的認識，也豐富了前人對該書的理解。在此之前，人們對此書價值的認識，主要在於「清談」。以年歲長於許筠三十多歲的尹根壽為例，他在《答海嵩尉書》中說：「今送《世說新語》極可觀，魏晉風流清談，盡在於此。」²²但在許筠看來，明代王世貞等人文章，之所以清麗可喜，就在於對《世說》文字的領會。通過他的鼓吹和實踐，人們也認識到，《世說新語》的文章極為可觀，實可效仿。如宋浚吉《答閔持叔》云：「《世說新語》文字可愛。」申綽《上伯氏》亦云：「閑時或看《世說新語》，周而復始，足散人懷。……《世說》則是小說之宗，其情到之處，佳麗如畫。留意於文者，必於此潤筆，然後方成其全才。」²³但由於許筠思想出格，行為不檢，最終死於非命，出於對其人的否定，以人廢言，也就連帶了對其文的否定，更連帶了對《世說新語》的歧視。李敏求《答吳三宰論選西垞集簡約兼示覆瓿稿書》云：「所示《覆瓿稿》者……尺牘時時出射鵬手，令人軒衡解權。而專取《世說》、《語林》及明人詞翰雋永以為生活。……使其平日少加操檢，不為悖亂之歸，得倫於恆人下中，則所著述豈不足傳世久遠也哉？」²⁴《覆瓿稿》（即《惺所覆瓿稿》）是許筠的文集，這段話讚美其文章淵源自「《世說》、《語林》及明人詞翰」，足以不朽，但其為人放蕩不拘，導致「悖亂之歸」，批評之餘尚抱惋惜。徐宗泰《讀弇山集》云：「彼弇山數子，既不出先秦之際，又不出兩京時，乃生於千數百年之下，遽欲泝千數百年而一蹴而並其軌，是顧不難哉？考其歸，則機軸精神不出宋人範圍，尤好用晉、宋人《世說》纖美語，又何其不倫也。」²⁵申靖夏《答柳默守》云：「皇明濟南、弇山諸名公之一生儘力於為文者，亦未見其可好。或竊取《世說》之語脈，掇拾

《左》、《國》之句字，荒雜無倫，浮誇不實。」²⁷這就用上了「擒賊先擒王」的手段。再進一步，就連《世說》也被否定了。李德懋《童規》云：「韓山子曰：『士大夫家子弟，不宜使讀《世說》，未得其雋永，先習其簡傲。』善哉斯言！」引文實出於明人薛岡（趙吉士《寄園寄寄》卷六引作「韓山子」），見其著《天爵堂筆餘》，顧炎武《日知錄》曾經引用。

上文說到許筠的《世說刪補註解》是域外第一部對《世說補》的註釋書，但由於此書在其生前未有刊刻機會，許筠的結局又是作為罪人被「正法」，其著作在身後也就漸漸散失，以至於無人知曉。一七六四年朝鮮通信使赴日，在與日本文人筆談之際，書狀官南玉被奧田元繼問到朝鮮是否有關於《世說新語補》的註釋時，竟茫然無知，只是為了在外交場合爭得面子，勉強來了一通炎炎大言：「弊邦人士專攻經術，如此書多有舊說，不復喜鑿求，故無發注者。」他完全忘記了（或者根本就不知道）許筠對《世說新語補》的註釋，較之人們習知的日本最早註釋之書——岡白駒《世說新語補觸》（一七四九）早了一百四十年，無端丟失了一個滿足虛榮心的機會。

《世說新語補》傳入朝鮮後，除了以上反響外，也激發出一些衍生之作。一是朝鮮刻本《世說新語補》，乃肅宗三十四年（一七〇八）用顯宗實錄字刊行。《世說新語補》秉承《世說》原先結構，將人物言談以類相從，原書的好處是可以因類求事，但也導致同一人之事散見各處，於是就有了改作，以人為綱，將散見各處之事隸於名下，以便觀覽。其書有：

一、《世說掇英》，寫本，佚名，藏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（今韓國中央研究院）。本書是《世說新語補》的選本，故稱「掇英」。每章之首冠以兩字，如「誠孝」、「訓子」等，以概括此章內容。卷末似為另一書，有「子道第一」、「兄弟道第二」等，卷尾一行「甲子二月初三日始克成編」，不知何人所作。

二、《世說新語姓彙韻分》，顯宗實錄字刊本，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。卷首列王世貞序及舊序（袁褰）一篇。其凡例云：「《世說》舊本以題目分門，而人名錯出，字職異稱，瑣簡短章，艱於考摭。遂分門以姓，分姓以

韻，合書事實於各其名下。至如複姓、無名氏、緇流、女徒，亦各類分焉。」又云：「一人而分見諸門，一事而分系諸人者，不可疊床於彼此，故於其首見者，並錄其始終，而隨其語意之所歸宿，主著互字，客著詳字，以備參考。」

三、《世說抄》，蒼史俞鎮瓚手寫本，藏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（今韓國中央研究院）。據卷末蒼史跋文，此書是根據《世說姓彙韻分》「考證其旨而增刪之」，完成於「甲申正月」，以李太王二十一年（一八八四）的可能性為大。與朝鮮時代相比而言，《世說新語補》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命運堪稱「熱捧」。

四、《世說新語》在日本

《世說新語》最早傳入日本的確切時間，途徑雖無可考，但通過小島憲之三巨冊《上代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——以出典論為中心之比較文學的考察》²⁸的卓越探討，可以發現大量實例，日本最早的史書《古事記》（七一二）、最早的漢詩集《懷風藻》（七五一）與最早的和歌集《萬葉集》（七五九）中，已使用了不少《世說新語》的典故。因此，我們至少可以推斷，在八世紀之前，《世說新語》已經傳入日本，在此之後，也還繼續傳入。不僅在文獻上有具體記載，如空海《性靈集》中《敕賜〈世說〉屏風書畢獻表》，而且有實物遺存，如唐寫本《世說新書》殘卷。

《世說新語》一名是後起的，其初為《世說》，後來用《世說新書》，最後演變為《世說新語》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新舊《唐志》皆著錄為《世說》。唐人提及此書，亦有作《世說新書》者。這在日本文獻中也可以得到印證。除《世說》之名外，《菅家文章》中有詩題云《相府文亭始讀〈世說新書〉》，唐寫本殘卷也以《世說新書》為題。

藤原佐世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是最早著錄其書者：「《世說》十卷，宋

臨川王劉義慶撰，劉孝標註。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兩種：《世說問答》二卷、《世說問錄》十卷^④。以往這兩種書不太為人提及，主要是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有不同版本有些版本（卻是通行版本）未著錄。按照我的推斷，這兩種書應該是日本人的著作，其性質屬於對《世說》一書的解釋。根據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的著錄，還有類似的註本如《註詩髓腦》一卷、《文儀集註》一卷、《註詩品》三卷。《詩髓腦》為唐人元兢所撰，《文儀集》乃總集（撰者不詳），《詩品》為鍾嶸所撰，其註釋大概都是日本人所為。因此，當時出現對《世說》的註解也不是偶然的。可惜皆已亡佚，無從詳考。尚有蛛絲馬跡可尋的是《世說私記》，儘管未見著錄。據大江匡房口述、藤原實兼筆錄之《江談抄》載：「《世說一卷私記》者，紀家、善家相共被釋累代難義之書也。」^⑤可知其撰者為紀長谷雄（八四五—九一二）和三善清行（八四六—九一八），《江談抄》略存其佚文，如云：「《文選》所言『麝食柏而馨』，李善以為難義，而件書引《集注本草文》明件事。以之謂之，兩家之博覽，殆勝李善歟？而件書中，有號太傅越之處，雖區區末學，明所見得也。被答云，應聲對之：是東海王越歟？」^⑥《文選》「麝食柏而馨」，出嵇康《養生論》句，今本李善注實有所釋，但善注有初註、復註、三註、四註之不同，皆隨時為人傳寫，故當初傳人日本為紀、善兩家所見者恐非最後定本。在《世說》一書中，此句見於《文學篇》「舊云王丞相過江左」章劉孝標註，故《私記》引陶弘景《神農本草經集注》以明之。

日本流傳的《世說新語》，值得一提的還有南宋紹興八年（一一三八）廣川董葦據晏殊校訂之刻印本，今藏日本尊經閣（所藏實際上可能是紹興末期的翻刻本）。此書將《世說》釐為三卷，附有汪藻《敘錄》和人物譜，在中國早已亡佚，彌足珍貴。此書和上文提及的唐寫本《世說新書》殘卷，經過近現代學人的努力，都在中國影印問世，給學者提供了很大的幫助。

在日本的平安時代和鎌倉室町時代，《世說新語》主要還是作為詩文寫作的典故被採擷，真正形成熱潮的是在江戶時代，《世說新語補》的傳入起到

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但也正因為王世貞《世說新語補》的受歡迎度大大壓倒了劉義慶的原書，用岡井孝先的話說：「弇州之學盛行海內，遂使人不得目見臨川之舊，而海舶所齎至《古世說》最罕矣。」^⑦大田南畝也說：「近世王弇州《補》本大行，而《古世說》廢矣，可勝嘆哉！」^⑧所以出現了有志於恢復「古《世說》」之人，類似凌濛初的《世說新語鼓吹》。岡井孝先和大塚孝綽編校了《世說逸》，將王世貞刪去的二百五十二章原文彙集一編，在寬延二年（一七四九）刊出。實則在他們之前，已有服部南郭之《世說遺》，輯錄的《古世說》條目較岡井、大塚更為完整，只是因為其書從未刊刻，所以向來不為中日學者所知。這些都可以視作劉義慶《世說》在江戶時代的迴光返照。

五、《世說新語補》在日本

《世說新語補》最早傳入日本的時間，途徑亦未能考。大庭修的不朽巨著《江戶時代唐船輸入書研究》，對於中國書籍在江戶時代的傳播作了經典性研究。但具體到《世說新語補》，我們能夠得到的最早信息，是享保二十年（一七三五）第二十五番廣東船《寶來書目》的記載，這較之於最早的和刻本——元祿七年（一六九四）甲戌八月林九兵衛梓行《世說新語補》都已經晚了四十一年。不過值得指出的是，雖然從書名上看，這些從中國運到長崎的書中，有《世說補》、《世說新語補》、《世說新語刪》、《世說新語鼓吹》和《世說新語》之異，很明顯，「補」、「刪」指的是同一書，《世說新語鼓吹》出自凌濛初之手，包含了劉義慶的原書和王世貞的刪補，只是將二者分開，將後者錄為別卷，合為一書。至於所謂的「世說新語」，根據寶曆四年（一七五四）《大意書》中的說明，並非劉義慶原書，而是王世貞的《世說新語補》^⑨。這也符合凌濛初《世說新語鼓吹序》中的說法：「《補》一出而學士大夫爭佩誦焉，……乃臨川本流傳已少，獨《補》盛行於世一再傳，

而後海內不復知有臨川矣。³⁷所以從中國運到日本的書，即使有書名之異，實際上還是異名同書，內容皆為《世說新語補》。

由於從順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）頒布「遷海令」，施行海禁，直到康熙二十三年（一六八四）頒布「展海令」，大陸商船才能夠重新開往日本。由於書的分量較重，從宋代開始的對日商業貿易，書籍所佔份額就很小，寬弘五年（宋大中祥符元年，一〇〇八）治部鄉原寫給楊億的信中就說：「商人重利，惟載輕貨而來，上國之風絕而無聞，學者之恨，在此一事。」³⁸以我的推測，「展海令」頒布后，儘管中國船隻絡繹不絕地駛向長崎，但所載貨物，其初還是以生絲、綢緞為主，大約從正德年間（一七一—一七一六）開始，由於書籍貿易有利可圖，才開始大量輸入江南書籍。《世說新語補》應該是在康熙二十三年之後，數量有限地輸入日本。大矢根文次郎在其《江戶時代的世說新語》一文中也推測《世說新語補》傳入日本是在元祿年間。他根據高野辰之《江戶文學史》中引用《餘毛之硯》（《餘毛の硯》）的記載，季吟在元祿二年（一六八九）提及「新渡之書」，就有「世說」之名，而這種「新渡」的「世說」只可能是《世說新語補》。因為日本方面對此書的喜愛，市場上存在供不應求的局面，所以才有了作為應急之需的元祿七年刻本的出現。但由於此書的刊刻較為匆忙，錯誤頗多，所以到了安永八年（一七七九），又有戶崎允明的《校正改刻世說新語補》問世。

江戶時代形成的「《世說》熱」，早就引起了學者的注意。這種風氣的形成，從學術界的一般認識來看，都會追溯到荻生徂徠。最早是吉川幸次郎，他在一九三九年發表的《世說新語的文章》⁴⁰中提出了這個看法。此文後來由 Glen W. Baxter 譯為英文，更加擴大了此說的影響。後來大矢根文次郎在《江戶時代的世說新語》中又持同樣看法，就幾乎成為關於這個問題的定論，迄今未改。但是在我看來，荻生徂徠的影響固然不可忽視，但如果追溯淵源，應該更往前推至林氏家學，方為知本之論。⁴²

與此前平安時代文人對《世說新語》的喜愛不同，江戶時代「《世說》熱」

的突出表現，是出現了大量的註釋、仿作和冒名之作。註釋之作應有四十多種，流傳至今為本人所寓目者尚有二十八種以上。茲列舉其目如下：

- 一、服部南郭《世說遺》；
- 二、服部南郭《世說補補釋名》；
- 三、岡白駒《世說新語補鱗》二卷；
- 四、釋文雄《世說新語補雞肋》二卷；
- 五、岡井孝先、大冢孝綽《世說逸》
- 六、桃井源藏《世說新語補考》二卷；
- 七、桃井源藏《世說新語補考補遺》一卷；
- 八、穗積以貫《世說新語補國字解》五卷（日文訓解）；
- 九、釋大典《世說鈔撮》四卷；
- 一〇、釋大典《世說鈔撮補》二卷；
- 一一、釋大典《世說鈔撮集成》十卷；
- 一二、釋大典《世說匡謬》二卷（日文訓解）；
- 一三、野村公台《世說新語補筆解》四卷；
- 一四、平賀房父《世說新語補索解》二卷；
- 一五、柚木綿山《世說新語補系譜》；
- 一六、大江德卿、井出萬年《世說誤字誤讀訂正》二卷；
- 一七、中井履軒《世說新語補雕題》二十卷；
- 一八、皆川淇園《世說啟微》二卷；
- 一九、高峰東峻《世說解摺拾》二十卷；
- 二〇、高峰東峻《世說解》三卷；
- 二一、服部仲山《世說聞書》；
- 二二、服部仲山《世說》（外一種）；
- 二三、田淵維善輯《世說新語補集覽》；
- 二四、恩田仲任《世說音釋》十卷；

二五、秦士鉉《世說箋本》二十卷；
 二六、大含和尚《世說講義》（日文訓解）；
 二七、近藤君達、齋藤子信、橫山乾甫《讀世說》二卷；
 二八、田中大壯《世說講義》十卷；
 二九、藤澤黃坡《世說抄》（日文訓解）。

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服部南郭的兩種著作，在人們以往的認識中，以勒為一書者而言，岡白駒的《世說新語補鱗》堪稱江戶時代《世說》註的嚆矢。但這僅僅是就有刻本刊行者而言，我最近新發現服部南郭的兩種《世說》註，其中之一是稿本，另一種是大鹽子顯在享和二年（一八〇二）的抄本。服部年長岡氏九歲，《補鱗》刊刻時，服部已經六十七歲，所以，服部的兩種《世說》註在完成時間上可能早於《補鱗》。服部又有非常著名的仿《世說》之著——《大東世語》。因此，他在日本《世說新語》的傳播、研究史上之地位也有待重新論定。以上所列只是親見之書目，實際上決不止於此數。例如金龍道人就另有《世說》註本兩冊（日文訓解），現藏日本京都興聖寺，承日本佛教學大學落合俊典先生見示，驚鴻一瞥，轉瞬即逝。金龍道人是僧人，江戶時代的「《世說》熱」中，僧人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。高峰東峻的兩種《世說》註，是在一九五九年京都建仁寺兩足院整理藏書的過程中發現的，金龍道人的《世說》註，也是數年前在京都興聖寺發現的。皆川淇園的《世說啟微》，是在其身後借京都圓光禪寺所藏活字排版印刷，甚至連其及門弟子都不清楚有此書的存在。而大含和尚（即雲華上人）自筆《世說講義》也是我最近新發現的一種《世說》註。由於對江戶學問曾研究的不足，加上有些學者的粗枝大葉，也會張冠李戴，如西川（滕）軌輯錄義茶翁校訂《世說》之成果（《世說訂正》附錄），川勝義雄將「義」誤讀作「賣」，從而得出「賣茶翁即釋元昭（一六七五—一七六三），乃黃檗宗肥前龍津寺僧人，釋大潮法兄，並與釋大典為好友」的錯誤結論。實際上，「義茶翁」就是上文提及的金龍道人。如今究竟還有多少寺廟或地方圖書館

中躺着有待發現的《世說》註（特別是僧人之作），實在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。

除了《世說》註，仿《世說》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，茲列其目如下：

- 一、林榴岡《本朝世說》二卷；
- 二、服部南郭《大東世語》五卷；
- 三、慧均定環《皇和世說新語》二卷；
- 四、大田南畝《假名世說》二卷（日語撰著）；
- 五、角田九華《近世叢語》八卷；
- 六、角田九華《續近世叢語》八卷；
- 七、僧超然《大谷世說》一卷（日語撰著）；
- 八、大田子德《新世語》一卷（日語撰著）。

自從王世貞等人注意到《世說新語》的文章，模仿《世說》體例以成「《世說》體」也風行一時，錢南秀教授《中古中國的精神與自我：〈世說新語〉及其續作》一書的第三章曾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仿作有較為全面的探討（也探討了日本的《大東世語》）。劉熙載《藝概·文概》指出：「文章蹊徑好尚，自《庄》、《列》出而一變，佛書入中國又一變，《世說新語》成書又一變。此諸書，人鮮不讀，讀鮮不嗜，往往與之俱化。惟涉而不溺，役之而不為所役，是在卓爾之大雅矣。」⁴⁶細究東亞三國的「仿《世說》」，考察其是否以及如何達到「役之而不為所役」的手段功夫，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課題。

第三個現象是大量冒名之作的出現。由於《世說新語》的流行，一些新撰的日語新書，雖然與《世說》無關，但也會冒用其名，以吸引讀者。茲據所見者列舉如下：

- 一、釋子登《和漢世說故事苑》五卷；
- 二、山崎尤最《世說愚案問答》三卷；
- 三、山崎尤最《世說愚案問答續編》；
- 四、松井簡治藏《世說記》二卷；

五、犖雅亮《世說兒談》八卷；

六、春名忠成《世說麒麟談》四卷；

七、馬鹿人《世說新語茶》；

八、高桑闌更《俳諧世說》五卷。

以上八種書，除《世說兒談》有對《世說新語補》的引用之外，其它諸書皆與《世說》無涉，僅僅是在書名上加以襲用而已。更有甚者，中川將行（一八四八—一八九七）在翻譯 Robert Chambers（一八〇二—一八七二）的書時，也以《泰西世說》作為其書譯名。儘管這些書與《世說新語》本身沒有什麼關係，但這些冒名之作也從某個側面生動傳達出江戶時代《世說》流行之一斑。

六、餘論

本文從空間上描述了江南文脈的流行，不難看出，江南文脈不只是一個地方性的文化單元，還是一個向東亞發散的空間存在。這不僅取決於其文化創造，同時也與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有着密切關係。

《世說新語》和《世說新語補》固然都成書於江南，將《世說新語補》帶入朝鮮半島的朱之蕃，也因其個人突出的文學和藝術才能享譽東國，經久不衰。兩百多年後，朝鮮柳疇睦還在《書朱太史之蕃帖后》中懷念道：「嘗宣詔於我東，專對之暇，筆落章成，大驚人，至今稱皇華之美，必曰朱蘭嶠，而得其餘唾刺墨，不啻若拱壁。」⁴⁷朱之蕃回國之後，朝鮮人還在玉溜泉為之塑像，趙文命《朱太史石刻小像》云：「蘭嶠老子昔東遊，好事形今石面留。著得幼輿岩壑里，未應磨滅舊風流。」⁴⁸值得一提的是，這首詩也運用了《世說新語·巧藝》中的典故：「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。人問其所以？顧曰：『謝云「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。」此子宜置丘壑中。』」⁴⁹謝幼輿「自謂」的話，見《世說新語·品藻》：「明帝問謝鯤：『君自謂何如

庾亮？』答曰：『端委廟堂，使百僚準則，臣不如亮；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。』其詩堪稱善用典故。朱之蕃還將自己的著作《詩法要標》留贈朝鮮半島，故此書雖然在中國已經亡佚，但作為江南文脈之一，此書在韓國還保存至今。

將《世說新語補》傳播日本，更是與江南的經濟活動有關。根據日本保存至今的各種《舶載書目》，自元祿至嘉永（一六八八—一八五四）之間，分別有享保五年（一七二〇）、享保二十年（一七三五）、寶曆四年（一七五四）、寶曆十年（一七六〇）、天保十四年（一八四三）、弘化二年（一八四五）、嘉永二年（一八四九）輸入《世說新語補》的記錄。事實上，自享保（一七一六—一七三六）以後，駛往長崎的船乃以江浙商人為主，而明清以來，刻書業也以江南最為發達。胡應麟說：「吳會、金陵擅名文獻，刻本至多，巨帙類書咸會萃焉。」⁵⁰王士禎說：「近則金陵、蘇、杭書坊刻版盛行。」⁵¹朝鮮李永得在談到北京琉璃廠時說：「蓋無書不存，然猶不及於南京書肆雲。凡求於北京書肆而未得者，往求於南京而得之云。」⁵²而在朝鮮文人看來，日本的人文水平自享保以來得到迅猛發展，根本原因就是從中國大量輸入江南書籍。如李德懋說：「近者江南書籍，輻湊於長崎，家家讀書，人人操觚，夷風漸變。」⁵³柳得恭也說：「倭子慧竅日開，非復舊時之倭，蓋緣長崎海船委輸江南書籍故也。」⁵⁴李尚迪又說：「近來中國書籍，一脫梓手，雲輸海舶，東都西京之間，愈往而愈興者，賴有此一路耳。」⁵⁵因此，本文雖然只集中討論了《世說新語》，但實際上，這也只是當時普遍現象的典型一例而已。

注

- ① 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，第二六九頁。
- ② 此據王國良《六朝小說與〈晉書〉之關係初探》統計，文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編《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》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，第五〇五—五二八頁。
- ③ 文載台灣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《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

- 論文集》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，第七七一—七八八頁。
- ④ 參見金富軾《三國史記·新羅本紀》卷四，吉林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，第四十五頁。
- ⑤ 參見張伯偉《魏晉風流·名僧風采·花郎道》，文載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《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》，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，第八二—八三八頁。
- ⑥ 《三國史記·新羅本紀》卷五，第六十五頁。
- ⑦ 《三國史記·新羅本紀》卷九，第一二二頁。
- ⑧ 《三國史記》卷四十六，第六五八頁。
- ⑨ 金大問《花郎世紀》，李泰吉譯，韓國釜山圖書出版民族文化一九九五年版，第二十五頁。
- ⑩ 同上注，第三十頁。
- ⑪ 同上注，第四十頁。
- ⑫ 同上注，第五十一頁。
- ⑬ 同上注，第五十八頁。
- ⑭ 同上注，第四十二頁。
- ⑮ 同上注，第五十二頁。
- ⑯ 李奎報《次韻吳東閣世文呈詔院諸學士三百韻詩》，《東國李相國全集》卷五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一冊，韓國景仁文化社一九九〇年版，第三四一頁。
- ⑰ 王世貞《世說新語補序》，載《世說新語補》卷首，日本元祿七年（一六九四）甲戌八月林九兵衛刻本。
- ⑱ 李宜顯《陶谷集》卷二十八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一百八十一冊，韓國景仁文化社一九九七年版，第四四八頁。
- ⑲ 張伯偉編《朝鮮時代書目叢刊》第八冊，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版，第四三〇—九頁。
- ⑳ 許筠《丙午紀行》，《惺所覆瓿稿》卷十八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七十四冊，景仁文化社一九九一年版，第二九〇—二九一頁。
- ㉑ 《惺所覆瓿稿》卷四十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七十四冊，第一七三頁。
- ㉒ 尹根壽《月汀集》卷五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四十七冊，景仁文化社一九八九年版，第二六〇頁。
- ㉓ 宋浚吉《同春堂集》卷十三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一〇七冊，景仁文化社一九九三年版，第六十五頁。
- ㉔ 申綽《石泉遺稿》卷三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二七九冊，景仁文化社二〇〇一年版，第五七五頁。
- ㉕ 李敏求《東州集》卷一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九十四冊，景仁文化社一九九二年版，第二二二頁。
- ㉖ 徐宗泰《晚靜堂集》卷十一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一六三冊，景仁文化社一九九六年版，第二三五頁。
- ㉗ 申靖夏《怨庵集》卷八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一九七冊，景仁文化社一九九七年版，第三二五—三二六頁。
- ㉘ 李德懋《青莊館全書》卷三十一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二五七冊，景仁文化社二〇〇〇年版，第五三三頁。
- ㉙ 奧田元繼《兩好餘話》卷下，書林明和元年（一七六四）刊本，今藏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。
- ㉚ 《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——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學的考察》塙書房一九六二、一九六四、一九六五。
- ㉛ 孫猛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》卅二「小説家」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，第一二二九—一二三六頁。
- ㉜ 《古本系江談抄註解》〔補訂版〕，武蔵野書院一九九三年版，第一四一頁。
- ㉝ 同上注，第一四四頁。
- ㉞ 《世說逸》卷首，東都書肆崇文堂寬延二年（一七四九）己巳九月刊本。
- ㉟ 《世說音釋》卷尾，尾張書肆文化十三年（一八一六）刊本。
- ㊱ 大庭脩《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》「資料編」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一九六七年版，第三四九頁。
- ㊲ 《世說新語鼓吹序》，魏同賢、安平秋主編《凌濛初全集》第七冊，鳳凰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，第一頁。
- ㊳ 江少虞《宋朝事實類苑》卷四十三「日本僧」條引《楊文公談苑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，第五七〇頁。
- ㊴ 《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世說新語について》，收入其《世說新語と六朝文學》，日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一九六〇年版，第九十一—九十二頁。
- ㊵ 《世說新語の文章》，收入《吉川幸次郎全集》第七卷，筑摩書房一九六八年版，第四五四—四七二頁。

- ④1 “The Shih-shuo · Hsin-yü and Six Dynasties Prose Style”, 同上注, 第五六五—五八五頁。
- ④2 參見張伯偉《日本江戸時代の〈世説〉熱》, 載《國際漢學研究通訊》第十六期, 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, 第一八五—二〇一頁。
- ④3 參見張伯偉《日本僧人世說新語注考論——江戸學問僧之二側面》, 載《嶺南學報》復刊第九輯,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, 第六十一—八十二頁。
- ④4 《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世説研究の一面——建仁寺高峰和尚の研究をめぐつて——》, 文載《東方學》第二十輯, 一九六〇年, 第一〇六頁。
- ④5 Nanxiu Qian, *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: The Shih-shuo · Hsin-yü and Its Legacy*, University of Hawai'i Press, 2001.
- ④6 《劉熙載文集》, 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, 第六十一頁。
- ④7 柳疇睦《溪堂集》卷十, 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三一三冊, 景仁文化社二〇〇三年版, 第四一六頁。
- ④8 趙文命《鶴岩集》冊二, 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一九二冊, 景仁文化社一九九七年版, 第四三八頁。參見左江《此子生中國》——朝鮮文人許筠研究》, 中華書局二〇一八年版, 第九十七—一四一頁。
- ④9 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, 第七二二頁。
- ⑤0 同上注, 第五一三頁。
- ⑤1 此書最早由韓國趙鍾業教授發現, 收錄於其《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》, 韓國太學社一九九六年版。
- ⑤2 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四, 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一版, 第四十一頁。
- ⑤3 王士禎《居易錄》卷十四,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, 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。
- ⑤4 《燕行錄》內篇第一卷「書籍」, 林基中編《燕行錄全集》第七十九冊, 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二〇〇二年版, 第二二八頁。案: 關於此書作者, 編者林基中署為徐有素, 實誤。根據我的考訂, 該書自著部分的作者應為李永得, 其它絕大部分乃抄錄中日各種書籍而成。參見張伯偉《名稱·文獻·方法——關於「燕行錄」研究的若干問題》, 載澳門大學《南國學術》二〇一五年第一期。
- ⑤5 李德懋《蜻蛉國志·藝文》, 《青莊館全書》卷六十四, 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二五九冊, 景仁文化社二〇〇〇年版, 第一六二頁。
- ⑤6 柳得恭《古芸堂筆記》卷五, 《雪岫外史》外二種, 韓國亞細亞文化社一九八六年版, 第一二五頁。
- ⑤7 李尚迪《讀薦錄》, 《恩誦堂集》續集「文」卷二, 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三一二冊, 景仁文化社二〇〇三年版, 第二四二頁。

(中國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)